

◀（上接 10 版）

得起欧风美雨的洗礼倒而不亡,便自有其颠扑不破之处。

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学? 如何开拓既符合经义本旨,又能引领时代精神的新经学? 时代在逼迫我们反思。

二

经学死亡了吗? 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,因为“道之不绝在人”。凡有儒学义理处,便有经学。大道所在,便是中国。

对于回到经学的声音,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。有人说,经学是祖先留下的遗产,代表着华夏传统的价值体系,所以必须回到经学。事实上也不尽然。因为再美好的价值,假如不是建基于对世界的颠扑不破的把握,便也都无异于空中楼阁。经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,首先便是因为它一直从知识体系的角度,来把握宇宙的实相。研究经学要警惕那种诉诸盲目情感,而缺少对真理切实体认的国粹式经学,尽管不同的情感表达也各有其自由。

同样,回到经学也不能只是因其有用。百年以来,国人对于学术,大多本着“拿来主义”心态,不仅未能虚心以求,且美其名曰“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”。章太炎曾说,中国传统学术其失在于汗漫。20 世纪许多西学研究,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先行的学问,却仍然只是汗漫。即便是人人欣赏的所谓科学,也因缺少真正的科学精神,而变成了科学主义。由此可见,所谓汗漫乃是一种思维方式,绝非经学的专利。有了这种心态,无论研究何种学问,都难以自立,《中庸》所谓“不诚无物”,信然。

所以,真正的经学绝非时下许多人宣称的,仅仅是可供驱遣的传统资源。经学是对经典视域的如实呈现,本身就是理解宇宙时空不可或缺的一个精神维度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,经学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。人类几个自足的知识体系,都是宇宙实相的显现,虽然面貌迥异,但诚如《华严经》所谓“因陀罗网”,虽彼此不同,却相互圆融无碍。不同知识体系的交摄互偏,体现的是真理视域的“大同”。

在人类已有知识体系之中,可以与经学并立的主要有三支。其一是以佛学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系统,婆罗门教、佛教的诸种形态及今之印度教等可摄于其中;其一是以神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系统,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诸

种形态可摄于其中;其一是以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系统,近代科学与西方学术皆可摄于其中。而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系统,则把诸子百家、道教的诸种形态及东亚儒学等皆摄于其中。事实上,在经学的第二期发展中,佛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完整地进入中国,就像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,两希文化也已经融为一体一样。随着晚明耶稣会士来华,所谓中西文化已经是四大知识体系的觐面相对。有些人把民族平等的口号简单移植到对文化系统的观察上,只是以地理范围来限定中国文化,于是经学被局限为汉民族一种偶然的思维形态。这种观点其实是不足置辩的。

因此,回到经学首先便是出于真理的需要,一个圆融大同的真理系统,不能缺少经学。在人类文明的一体化进程中,经学不仅应当占据一席之地,而且完全可以以经学为基本形态融摄众说。这样,回到经学也不止是国人的需要,而应是人类建构其自我意识的需要,是人类理解自身历史的需要。缺少了经学的历史,特别是经学的内史,人类的自我意识便是不完整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内在地理解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精神历程,如同理解其他文化一样,便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反思。相比之下,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不过是精神的单维形态。在这里,一切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都将被破除,人类达到其理想的世界性的生存。

三

那么,理想的新经学将是怎样一种形态呢?

新经学首先应该是真正的经学。经学应该摆脱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之后,诸子借经学以文饰己说的汗漫形态,回到孔孟时代,原初儒学那种清明的理性精神之中。无论是否“阿世”,汗漫的学术都一定是“曲学”。因此,可以有经学对诸子、佛学、西学的融摄,但不能有诸子、佛学、西学立场的经学。在以往,出于对经学纯粹性的捍卫,形成了道统观念,这一观念在 20 世纪尽管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,但其内在合理性不容抹杀。在人人依傍六经的时代,道统观念在某种意义上,代表着经学的自我澄明。

新经学应该是明体达用的经学。所谓明体达用,最初即表现于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之中。先是孔门德行、文学、

政事、言语四科,其次是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,最后是清儒所谓义理、考据、经济、辞章。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说,如同一株大树有其根干枝华,四者分别对应,都与这一基本架构相符。中国文化本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。清儒以考据、义理分别汉宋经学,虽然大体符合两系经学的侧重倾向,却没有意识到,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本末体用之学。体用在清学那里本来就是分裂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20 世纪所争论不休



六经责我开生面。
——王夫之

的两个观念,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说,都是对文化的一种粗暴的、机械式的理解,没有意识到本末体用本来是一种有机的关联,不可以随意嫁接。也正是因此,新经学不仅应该具有引领及反思时代精神的新义理之学,也应该形成以新义理为基础的,新的考据、辞章与经济之学。借用时下流行的西学术语来说,新经学便是要重建以经义为基础的新哲学、新史学、新文艺学与新社会科学。

新经学应该是继往开来、新新不已的经学。今天,尽管许多接续传统的努力值得尊重,甚至也是初学者的必由之路,但经学不应该止步于以往的学术形态,满足于做一种有经学立场的学术史研究。也不应该简单地用旧经学之中已经不合时宜的形态来画地为牢。新经学应该回到仁智一体的德性视域之中,重建与当代的精神联系。

新经学应该是对不同知识体系开放的经学。经学将开展与世界不同知识体系的积极对话,经学融摄不同知识体系的过程,便是世界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。鉴于佛学传入以后,经学第二期发展的事实,在未来的经学实践中,除了深化经学与佛学知识体系

的对话之外,如何消化已经融合了两大知识体系的西学,将是新经学最重要的使命。

尤其关键的,新经学应该是回归经典的经学。假如以上述期许为尺度,那么由马一浮、熊十力、梁漱溟、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复观诸先生所代表的,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、强调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,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经学,特别是其中的新义理之学。以哲学自期的新儒学,在经学中的角色与系统神学在神学中的

地位相近。不过,新儒学此前虽然拓展了经学的义理维度,恢复了内圣外王的基本架构,尚远未臻于圆融。客观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中西学术的广大深邃,难以一蹴而就;主观的因素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

其一,儒学义理尽管有本心作最后根据,但无数六经注我的例子已经表明,经学需要一个可以持循的基本尺度,来规范古往今来大量的过度诠释。这个尺度便是回到那些虽然具有历史性维度,但是却在义理上贯通如一的经典之中。六经是古人之迹,但同时也是圣人之迹。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迹,应该是不即不离的关系。换言之,经典是经学的理想在上古至春秋时代那个具体时空中的体现。通过疏释,可以使经典之中那些历史性的大义被还原,逐渐显发其超越时空的微言。这种微言在当下时空的具象化,则是这个时代理想的新经学。对原典的贯通性理解,是新儒学乃至整个新经学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。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“我注六经”根本有别。因为只有能够“六经注我”,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“我注六经”,反之亦然。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解释学循环。

其二,为了在源头上贞定中国文化,早期新儒家把主要

精力放在新义理的探索上,因之顺应 20 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现状,接纳民主政治作为外王之学。但是缺少从经学大义上的充分疏通与审视,所谓西用还没有内化到经学义理这一本体之中。以至于被后起者单纯贬低为心性之学,而另有所谓“政治儒学”之论。事实上,缺少新义理支撑的“政治儒学”,很容易流于信仰式的原教旨主义。只有重新回到经典,才能在根本上疏通新的经济之学,这是新经学的应有之义。

四

新经学应该接续儒家经学第三期的现代发展。纵观历史,作为一种思维方式,经学起源于华夏文明之初,经上古三代之民族融合,在东周后期由孔子完成知识体系的自觉,形成了经学的圣人谱系与经典。经过孟、荀两系的发展,以今文经为主的六艺之学最终被政典化,并支撑了两汉时的世界观。这一时期代表了经学的自我发展,是为经学第一期。

随着道教崛起,东汉以后一方面发生古文经学的更化,一方面则是玄学兴起。与此同时,作为新知识体系的佛教传入,经学开始全面更新,并因宋明理学之结束而完成。北宋五子至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等皆为道统所宗。这一时期代表了经学对佛学的融摄,是为经学第二期。

晚明以降,经学开始融摄中西,是为第三期,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诸家卓然为其开山。其后,乾嘉汉学虽以考据之学破宋儒藩篱,尚不足以言新经学。至晚清,章太炎慨今文经学之汗漫荒唐,欲引佛学及诸子自卫,惜所宗在子史小学,经学尚未真正复兴。

能够重拾经学第三期使命的当属现代新儒家。其中马一浮倡道东南,首揭六艺统摄西来学术之大义,新经学始定其基;熊十力无待而兴,欲会通中印欧西诸哲,新经学始端其向;梁漱溟以“孔家生活”奔走济时,新经学始发其用;牟宗三以良知坎陷贯通仁智,新经学始开其新。学者倘能善继善述,不仅回归经典,且能体用兼备,则中华文化必将如大《易》所言,穷变通久,而大成可期。

吾辈虽不敏,愿尝试之。有志斯文者,盍兴乎来!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;本文为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刊物《新经学》的发刊词,略有删改)

